



施一公：与清华结缘

○ 学生记者 陈欢

施一公，世界著名结构生物学家，“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长江讲座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1989年，他以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从清华大学生物系毕业并获学士学位。

1995年，他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导师破例宣布“施一公是我最出色的学生”。

2001年，他仅用三年多时间便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职（副教授），创造了分子生物学系的晋升记录。

2003年，他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

2007年，他被授予普林斯顿大学最高级别的教授职位——讲席教授。

2008年，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他婉拒了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千万美元科研资助，谢绝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多次挽留，毅然辞去终身教职，全职回到母校清华大学，执掌生命科学。

重回清华园后，施一公几乎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在美国和中国做同样的事，在清华会更踏实。回到清华后，我每天早上都很激动，又是新的充实的一天，又可以去做很多事情。当你很有理想、心情愉快的时候，觉得特别有劲”，施一公说。

往事：少年壮志不言愁

施一公进入生命科学领域可谓机缘巧合。

1984年，高中二年级的施一公参加全国高中数学和物理竞赛，分获一、二等奖，由此获得保送上北京大学物理系的机会。但当听了清华大学招生老师讲起“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之后，他为之吸引，并毫不犹豫地决定去清华大学。彼时，施一公对生命科学一无所知，清华大学生物系也才复建一年。只是凭着直觉，施一公成为清华生物系复系后的第一批本科生。

1989年，在被誉为“牛棚”的清华，施一公以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在出色完成生物系课程的同时，他还以优良成绩修完了数学系

双学士学位要求的所有课程。而作为清华大学体育代表队的一员，他还创下并保持了清华大学一万米竞走的记录。

如果说本科期间对生物的学习更多地是为了证明自己，此时的施一公还并不确定生命科学是否将成为自己未来一生的志业。1990年初，获全额奖学金的施一公来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生物物理学及生物化学博士学位。由于并不确定自己的学术兴趣，博士的前两年，施一公一直想要尝试转到计算机方向，为此学校还一度想停止向他提供奖学金。

一次，在实验室科研报告会上，系主任兼导师介绍了一项重大突破，基础扎实的施一公却发现了其中的一个演算漏洞。这件小事激发了他对于生命科学探索的好奇和热情。从此，他的创造力便开始在生命科学领域闪现灵光。在国内一直保持“第一”的运动员施一公，一旦专注于生命科学，再一次用他的才智和勤奋证明了自己。持之以恒，每天读《华盛顿邮报》，每天背25个新单词，他的英语水平迅速提高。在科研上，他的能力与潜力也逐渐展示，毕业时，导师破例公开宣布：“施一公是我最出色的学生”。1995年，施一公获得了博士学位，第二年赴纽约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中心结构生物学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探索肿瘤发生的分子机理。

1997年，还没完成博士后课题的施一公便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助理教授。1998年2月，施一公开始了他在普林斯顿大学长达10余年的科研、执教生涯，专注于细胞凋亡分子机制的研究。所谓细胞凋亡，简言之，便是机体为了整体的健康而主动进行的个别细胞的“自杀”过程，它的异常与肿瘤、艾滋病以及一系列重大免疫疾病之间有着至今犹待破解的联系。选定这个方向，施一公希望从根源上揭示细胞凋亡和肿瘤发生的分子机理，从而为治疗和预防癌症带去福音。

2001年，施一公因为出色的科研成果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晋升为副教授，创造了该校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晋升最快的记录；2003年，由于对细胞凋亡及肿瘤发生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施一公获



得国际蛋白质学会 (The Protein Society) 颁发的“鄂文西格青年研究家奖” (Irving Sigal Young Investigator Award)，成为该奖项成立以来首位获奖的华裔生命科学领域研究学者，这一年施一公刚刚36岁；同年，他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4年后，他被授予普林斯顿大学最高级别的教授职位——终身讲席教授。

在普林斯顿这片科研的沃土上，施一公逐渐攀登上了自己科学生涯中的第一个高峰——他成为了国际结构生物学界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之一。哈佛、MIT、约翰·霍普金斯等10多所美国顶尖级大学纷纷向施一公抛出了“橄榄枝”。随着他进入学术发展的上升期，普林斯顿为他提供了越来越优厚的条件——该校分子生物学系中最大的实验室以及最高的科研经费。2008年，他入选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 (HHMI)。这是美国生物学研究领

域对于科学家的最高认可之一，入选者将可以获得近千万美元的科研资助。

此时，施一公的美国生活已经十分优越：学校资助他购买了500平方米的独栋花园别墅，同是清华毕业的妻子就职于国际制药大公司，一对龙凤胎儿女享受着快乐的美式幼儿园教育……

正当所有人都以为施一公将续写他在美国的光荣之路时，2006年，他做出了一个让身边所有人都为之震惊且敬佩的决定——回中国，回清华！

回归：努力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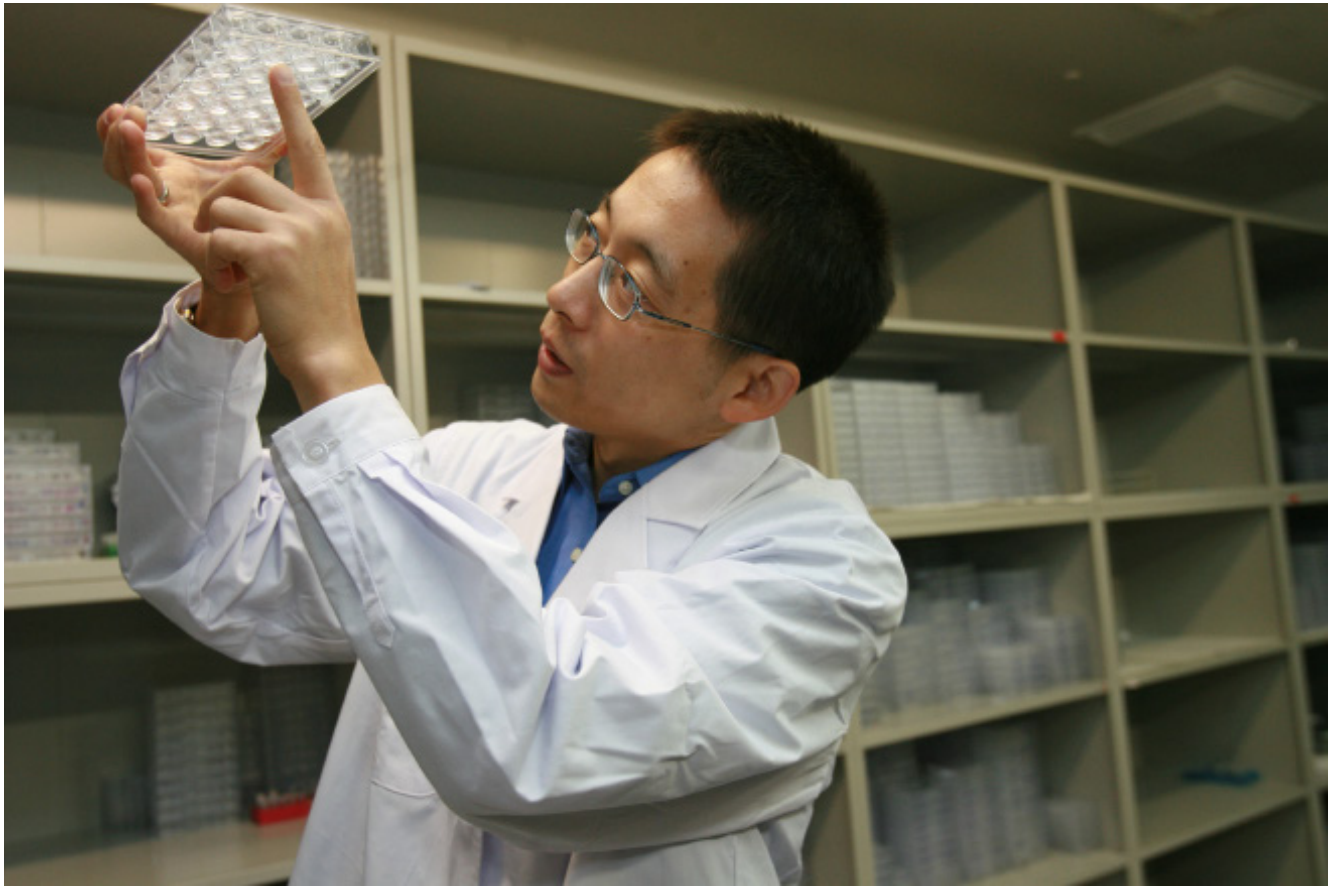
2006年，“施一公要回来啦”的消息一经传播便立刻引起巨大反响，国内主流媒体称他归国的意义不亚于当年钱学森、郭永怀的回归。与此同时，美国《纽约时报》也专门撰文对他的归国进行报道，称“他正在成为将亚裔和其他外国裔 (foreign-born) 生命科学家推出美国的重要力量”。

然而，这“突然”的归来对施一公而言，却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在美国，尽管被各种荣誉包裹着，但内心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每天都是按部就班地生活，仿佛人生再也没什么可以奋斗的了。”施一公这样对记者讲述他当初的困惑。“美国一些大学的院系请我去做院长、系主任，在别人眼里，我在美国有光明的前景，但我认为我在美国的前途不如在中国光明。为什么呢？这是我内心的感觉，我觉得美国有没有我关系不大，如果我在职位上或科学上做得更好，对这个国家进步的贡献也就是从100到100.1或101，不过如此。但回国就不一样了，因为中国还有很多东西亟待改进，从科技体制和基金评审到大学教学和科研水平，相对于美国一流大学还有相当差距，我觉得我回来以后可以有更大的作为，这种成就感对我来说很重要。”

每次回国参加学术会议或者演讲，尽管时间短暂，却都让他感觉十分激动。每当飞机在中国降落，看到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施一公内心都会澎湃不已，而走时又会十分惆怅，惆怅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与自己无关。2006年5月，于施一公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拐点：在他回国参加中国生物物理学年会期间，时任清华校党委书记的陈希找到他说，清华急需人才，尤其是医学院和生物系，问他是否可以全职回清华工作，他仅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便做出了全职回国的决定。



1995年，施一公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学位



施一公做实验

大部分人都担心他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但在施一公心底，这是最自然不过的选择。他说，“有谁不爱自己的祖国呢？……人一辈子有很多东西可以再生，可以重新拥有——财产、房产甚至国籍，但只有一点你没法改变：从生下来那天起你就是中国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负责任地安排好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实验室各位成员的出路后，2008年，施一公终于如愿以偿，回到了让他魂牵梦绕的清华园全职工作。正如他不止一次的说“总有一天，我会回到祖国去”。

作为领军人物，他的回国在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国际知名神经科学家鲁白说：“施一公这种大师级的人物能够放弃美国优厚的科研环境，回国创业，可谓海外华人的典范。”当然有许多人对其持观望态度——“像他这样级别的人回国，能否适应中国的人文环境与科学研究的体制”也是个问题。

因此，这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选择。

作为“千人计划”的倡导者之一及该计划首批引进的海外人才，施一公要面对无数双眼睛的检视，而他在国内能否继续保持之前的学术状态，也将影响着那些对回国持观望态度的海归的选择。

但与他人的怀疑、担心不一样，施一公内心是十分笃定的：对于生活，他的要求从来都不高，因而那些已经获得的外物，他并没有十分强烈的留恋；而对于自己，他相信自己不会变，也不可能变。

本职：“我是回来育人的”

如果说，施一公在美国的科研与生活逐渐进入一种稳态，那么回国后的一切则使他重新进入到一种动态——时间仿佛重新开始，他已准备好“玩命”地大干一场。

回国之后，施一公给自己定了三个目标，第



一个便是“希望影响一批年轻人”。他曾经说道：“经常与国内一些大学生座谈，发觉其中有相当一些人顾及的只是眼前利益，而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人活一口气。年轻人代表中国的未来，他们应该有理想，有做大事的胆魄和敬业的态度。我希望自己不仅仅在实验室里指导研究，而且还特别愿意与年轻人交流谈心，希望他们树立远大的志向，不要熙熙攘攘只为稻粱谋。”

“影响年轻人”，实验室是最有效直接的“用武之地”。因此，无论多么繁忙，施一公都会首先保证自己在实验室的时间。在每周的组会上，他会和学生共同讨论实验的最新进展以及国际学术界的最新发现，通过讨论甚至争辩引导学生的逻辑思维。他会信手拈来科学史上或自己过去实验室的逸闻趣事，让本应枯燥的组会立即生动活泼。平时，他一有时间便到实验室里，对学生的实验进行详细指导，参与实验的细节讨论或亲自演示操作。

全心的投入获得了迅速的回报。如今，他在清华大学领导的这个2007年才开始运转的年轻实验室已经取得了多项蜚声国内外的研究成果，甚至已经超越当年他在普林斯顿巅峰时期的水平。自2009年起，施一公的清华团队在世界顶级学术期刊*Nature*、*Science*、*Cell*上发表论文10篇，其科研成果连续两年入选“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

更让施一公欣慰的是，他看到了自己对学生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有些学生刚进实验室的时候还找不到北，现在已经能担当重任了”，施一公自信地说，“我一点也不怀疑，假以时日，我会把他们雕琢成精美的工艺品”。

“经常与国内一些大学生座谈，发觉其中有相当一些人顾及的只是眼前利益，而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人活一口气。年轻人代表中国的未来，他们应该有理想，有做大事的胆魄和敬业的态度。我希望自己不仅仅在实验室里指导研究，而且还特别愿意与年轻人交流谈心，希望他们树立远大的志向，不要熙熙攘攘只为稻粱谋。”



施一公参加“千人计划”专家会

除了通过实验室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讲堂同样是施一公挥洒热情的地方。他一学期有60多节课，讲堂上除了专业知识外，他会告诉学生在生命科学领域中，那些做出巨大发现的科学家也会有不为人知的“小糊涂”，他们曾遇到何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却能最终一一克服并走到人生的高处。如此良苦用心，施一公只是希望学生们能逐渐破除对捷径的迷信，能够志存高远。他非常赞同顾秉林校长说的清华人应当“做第一等的事，做中国的脊梁”。

在2011年本科生开学典礼上，施一公做主题发言，他感慨道：“价值观念在一次次受到严重冲击后被扭曲，伦理道德的底线在一次次地被放弃、被突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发不可琢磨。”“面对复杂的社会舆论和常常扭曲的网络传闻”，施一公希望学生“树正气、敢担当、有作为”，“要培养独立思考的辨识能力，要义不容辞地做正直之人”。在许多场合，施一公也呼吁学生要“做诚实的学问，做正直的人”。

平时与学生交流，施一公也毫不吝啬时间且真诚相待。“在学生面前，我不会去掩盖什么，我只是想把自己真正信奉的理念告诉他们，这样他们才有可能相信。如果你把自己都不信的东西抛过去要别人相信，这样的教育肯定会失败”，施一公说。

清华园以外，施一公也非常愿意与其他高校的莘莘学子们交流。采访时，他提到即将去南京理工大学给学生做一场演讲，几天后，记者便在网络上看到，一位南京理工大学的学生在日志中感叹，施

一公像是“寒冬中的烈火”。

施一公在科学网上有自己的博客，一篇篇博文《鼓励学生唱“反调”》、《如何提高英文的科研写作能力》、《学生如何提高专业英文阅读能力》等等，都是他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把自己的科研感悟通过网络与广大学子分享。在学生们的心中，施一公已然成为了极具影响力的良师益友。

施一公期望学子们能够自守精神品性，成长为为理想奋斗的有志青年。“再过二三十年后，当我在清华退休的时候，能看到自己的学生成为理想远大、影响社会甚至影响世界的人，那将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啊！”施一公充满希冀地说。

改革：行政与学术分离

施一公回国的第二个目标是在清华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高级人才培养和尖端生命科学研究基地，

与大家一起努力发展中国的生命科学和基础医学研究。因此，在从事高水平的科研和育人之外，施一公也不遗余力地推动清华大学生命医学学科的体制改革。

作为清华大学生命学院院长和医学院常务副院长，施一公首先着眼于人才引进和人事制度改革。自2008年以来，清华大学生命医学学科面试了近200位应聘者，遴选了50余位充满活力并极具学术能力的科研人才加入清华团队，建立自己的实验室。人才的发展需要体制的保障。施一公与他的团队积极引入tenure track制度，使生命科学学院成为清华大学人事制度改革第一个试点单位，理顺行政与科研的关系，从而为教学科研创造更加优良的环境。这件事情其实阻力并不小，但施一公认为，“让科学家做科学家的事情，行政为科研教学服务”，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且有创造力的体制。



施一公指导学生实验



施一公在办公室工作

在进行学院教师层面改革的同时，教学改革也在进行中。其中重大的举措就是为本科生减免学分，采取措施加强学生自主性。另外，在教育部支持下，与同为海归的北大生医饶毅院长合作，清华北大整合了各自的资源，创建了一个联合培养研究生的项目。此外，两个学院正在尝试本科生教学之间的合作模式，两校将各自拿出主课和重要选修课供两个学院学生共享。

施一公在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方面也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探索。2011年4月成立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生命科学联合中心”，是整合资源、强强联手、协同创新的一个有效尝试。生命中心在体制改革与管理、队伍建设与招聘、人才培养与招生方面积极与国际接轨，推动教育与科技紧密结合，创立寓教于研的拔尖人才培养模式、打造高效运行的行政服务与支撑体系。

虽然施一公用他个人的影响力在清华大学倡导着、尝试着、进行着这些体制上的变革，但他更希望这种适合人才发展的软机制，可以在中国其他高校得到推广。他说：“中国的科技和教育体制、中国大学的科研和教学，相对于美国的一流学校都还有相当的距离，中国正在为此而努力。我会发自内心地为清华、为中国科技和教育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多走一步，付出更多。我对祖国充满信心。”

初步建立了较为理想的管理体制后，施一公就把行政事务交给了专门负责行政的副院长，自己则更加专心于研究与教学。当记者问到他会不会受行政事务所累时，他自豪地介绍，现在除了每个月两个小时的院务会议外基本上没有其他行政事务，平时也很少参加学校的各种行政会议，这些都是行政副院长的职责，自己就有了更多时间泡在实验室里。

一系列改革、发展的举措很快就在学院内收到了积极的成效。“现在我们在生命科学和基础医学方面的科研实力几乎翻了一番，生命

科学学科已进入一个稳定而又快速发展的时期。”施一公用自豪的口气说。在过去三年的时间里，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和医学院的师生已经在世界顶尖学术期刊*Nature*、*Science*、*Cell*上以通讯作者身份发表或被接受18篇论文，在一些领域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愤青”：“极其在乎中国会怎么样”

在清华大学之外，施一公以实际行动践行其回国的第三个目标：“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改善和改进国家的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做些努力，与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推动我国科教体制的改善，为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做出一些贡献。”

回国后的施一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会尖锐地指出教育和科技领域的问题；2009年他开始在科学网上写博文，每篇文章都会有逾万人次的浏览；2010年，施一公和饶毅在*Science*杂志上发表评论谈论中国的科研文化，直言中国目前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在阻碍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评论甫一登出，便引起了众多讨论。施一公大力倡导的高层次人才引进也不时遭到非议。对此他忍不住要说：“事实胜于雄辩，历史自有公论！有些人在发议论的时候经常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评论、夸大几件孤立的或者负面的事情。希望大家用历史的目光、站在科技改革创新和

国家发展的立场上，看待人才引进。”

与回国时友人担心施一公会被“酱缸”染黑不同，如今的施一公依旧痛感十足、不平则鸣，“如果愤青定义为尽最大努力说实话、说真话、尊重事实，那么我愿意一直做这样的愤青”，施一公坦然回应，因为在他心中“极其在乎中国会怎么样”。去年年底，由于北京的坏天气，施一公把很早就写好的一篇关于空气污染的文章发表在了博客上。施一公在文中直言，“国内一次次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以及我切身感受到的国内许多大中城市的严重污染，让我不安与愤怒。”

回国几年来，施一公对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和现状越发忧虑。中国的科技现状究竟在世界上处于什么水平？能否支撑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变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能否保证国家安全？面临这些挑战，该如何改进甚至改革科技体制？如何让创新的科研文化主导中国科学的未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常常困扰着施一公，但他还是坚定地认为，中国有希望。于是，施一公努力做一名中国科学界的谏者，让整个社会更加充分地意识到中国目前还存在的问题，摒弃以单位利益、部门利益为考量的做事方式和观念，从中国的大局出发，同心协力、共同推进科技体制改革。

不仅是国家大事，对身边的陌生人施一公也有着强烈的关切之心。一个冬天的深夜，他骑自行车从实验室回家，深夜的校园格外寂静，只是骑着骑着，他突然看到前方有个老人正在捡拾路边的垃圾。施一公心中恻隐：“大家都在熟睡，一个年迈的老人却在寒冬深夜里捡垃圾，他的家人呢？”施一公从自行车上下来，唐突地叫了声“大爷”后，也不知说什么好，便把身上所有的钱掏出来塞在老人的口袋中。老人还来不及拒绝，施一公就赶忙跨上车，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飞快地骑走了。回想起这件事，施一公难掩他的痛心“那个时候我停下来了。但是现在社会上种种街头行来行往见死不救的新闻……有时候，我不知道我们的社会怎么了……”

当一个人在试图改变世界的时候，总会遭遇无力感。现在，面对现实，施一公只能要求自己做一个有良知的人：“民族命运是一个很复杂的方程，十几亿人的综合就是中国的将来，一个人很难有作为。”然而，不管怎么说，他依旧是一个乐观的

行动者。施一公愿意保持自己的直率与敏锐，但绝不认同做只知抱怨而无建设性思考的“愤青”，他更愿意谈责任，他感到自己身上的责任很重，怀揣理想的施一公除了做好科研，还屡屡发声撰文，为国家科技制度的创新呐喊，希望带动其他海外高层次人才人才的回归，正如他在“千人计划联谊会”上和与大家分享的那样“树正气，去私心，敢担当，有作为。”

普通人：拒绝被神化的“牛人”

对施一公来说，他是一位科学家、教育者、改革者、行政管理者，但在这些标签之下，他更愿意称自己为一个普通人。“我们总是生活在一个表面现象统治和笼罩的世界里”，他认真地说，“咱们国家太看重外表。比如只有在中国，介绍学术人物的时候，先介绍其领导职务，然后是耀眼的光环比如院士、获奖等等，最后才提及是某某教授，很少评论该人对科学研究的贡献。”他觉得，这样不好，“这个人会被神化，让人觉得高不可攀。对青年人的影响尤其不好。”他甚至说：“两人认识了之后，在平时的学术、生活交流中还称呼头衔，比如某教授开口闭口称呼另一位教授某某院士，或某某院长，或某某主席，我觉得那是对一个人的讽刺和对科学文化的鄙视。学术人之间，互称‘老师’足矣。”他曾说，“科学可能是高尚的，科学家则是普通人”。

作为普通人，施一公是儿子、丈夫和父亲，他也会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喜怒哀乐。然而，他留给那个有着普通人七情六欲的自己的时间并不多。

作为儿子，施一公繁忙的工作使得他只有早餐时间能与母亲见一面，让想对母亲尽点孝心的他觉得自己并不是个孝子。作为丈夫，施一公觉得妻子为自己付出和牺牲了太多太多。作为父亲，他能给龙凤胎儿女的时间也是少之又少。2008年，施一公刚全职回国时，妻子和儿女都还在美国，他只能在博客上写《我想儿子》的文章，表达他对家人深沉的思念。

物质上，施一公并没有太多要求。在美国时，一辆破旧的二手车他用了很多年。对于他来说，吃是最大的物质嗜好。讲到这里，施一公饶有兴致地和我们描述了前两天晚上他的一顿“饕餮大餐”——那天12点多从实验室回家，他顺道去了学



施一公参加校运会接力跑

校北门外面的烧烤店，买了20串羊肉串，拎了一瓶啤酒，带回家边看电视边享受他的美食，“对我来说，这实在是莫大的享受。”说这话时，洋溢着满脸欢乐的施一公，单纯得像个三岁的孩子。

其他娱乐活动也很少，一直坚持的长跑是施一公放松自己、劳逸结合的主要方式。想运动的时候，他就会去操场跑两圈。他也挺喜欢睡前看看谍战片放松一下，觉得《暗算》最经典，还抽空看了《悬崖》。当施一公谈到这些时，脸上的表情像是吃到了糖的孩子般轻松，然而，片刻后他马上自我反省：“娱乐挺好，但是这个民族如果只有娱乐就太糟糕了。”即使是在这种极其寻常的生活享受中，他那个“政治我”也会突然跳出来，把一切轻松氛围都毁掉，忧患之心顿时成为主导。

清醒的思考会带来痛苦，施一公经常会有非常强烈的孤独感。

“我更能理解鲁迅的心境了，”无奈之时，施一公只能摇摇头感慨。妻子也会牢骚般地劝他，“想那么多事干嘛，孩子考分下降了你不多花点时间”。

不过，纵然会有失望、忧虑或者抱怨，施一公依然干劲十足。他说：“我是一个乐观的人，走在路上还会哼小时候唱过的歌。”

在采访时，有那么一两个瞬间，施一公会流露出如小孩般的认真。比如，拍照时他会下意识地用手将头发理顺一下，担心自己不修边幅的照片会“不好看”。采访快结束的时候，他很高兴地拿出他冬天里带的雷锋帽，戴在头上向记者展示，这时，他的笑容在冬日阳光中显得格外灿烂。

如今，回国已经5年，施一公有觉得不尽如人意的时候。然而，作为一个乐观的理想主义者，他依然在自己的领地上辛勤耕耘着。“现在是我最好的年龄”，说这句话的时候，施一公的神色间依然激情澎湃，他的情感基调依然乐观且自信。

“在我的领域里，世界上没有人比施一公做得更好”，这是施一公一直的目标。✎

做一个真诚的人

——对话施一公

○ 学生记者 陈欢

《**水木清华**》：您对中国的现状和问题怎么看？

施一公：我觉得在中国，有一个自下而上过程的同时，更重要地要有自上而下的过程。东方文化是上行下效，我经常对中国的领导抱有强烈的期望。我确实希望中国能有强有力的领导人，将中国带入盛世。很多人都有强国的大梦，这就需要领导人有远见，有勇气，敢做敢为敢担当。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国家的前途可以十分辉煌。如果有一批人，大家志同道合，为了一个目标去奋斗，便有更大的希望了。

《**水木清华**》：怎么看待中国教育和孩子创造性这一关系？

施一公：我们有1400万中小学教师，他们的文化环境决定着中国创新的原动力。除非他们的观念改变，但是怎么改变，又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现在，做什么事情都会有人指指点点。比如，高校在做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很多人就认为这很不公平。但是，创新本身就意味着做少数，有争议，就意味着孤独。我们的文化，是鼓励创新的吗？这一点，其实最值得我们大家思考。

现在，人大附中校长刘彭芝正在做中小学校长的培训，这非常好。改变中小学校长的观念，自然就会改变中小学教师，这样我们的孩子就有希望了。

我们的大学也一样，大学校长也要崇尚创新，领导的选拔机制也要改革。有些推荐上来的“老好人”缺乏创新意识，按部就班，这样会使大学缺少活力，使大学停止发展甚至退步。和人一样，大学也要有它的品性与精神，但是现在这些都被最小化了。

《**水木清华**》：您怎么看“院士落选”这件事情？

施一公：大家对这个话题的关注远远超过我对它的在乎，当不当院士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事情。但是，社会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太多了，关注度太高了。不应该这样。我从2006年开始在清华建立实验

室团体，整整五年了，全职回来也已经四年多了，回国的目标中，从来没有当院士一条。我觉得一个学者如果把当院士作为终极目标，未免太狭隘了。整个社会这种不应有的关注甚至让应该受到关注并讨论的问题得不到重视。

《**水木清华**》：喜欢看书吗？

施一公：很喜欢看书，但时间不够。我最近买了一套《朱镕基讲话实录》，时不时地找时间阅读。朱总理的一些理论知识我不是很明白，但我觉得他没有一句虚话，说的都是很实在的，他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这也是我尊敬他的主要原因。

《**水木清华**》：上网时会干什么？会关注网上的新闻时事吗？

施一公：我很想上网，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可你知道我的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的，所以我只有挤时间上网，更多地在电梯间或在外出的车上依靠《手机报》了解当天的新闻。

《**水木清华**》：会有孤独感吗？

施一公：经常。

《**水木清华**》：怎么看待网上的负面评价？

施一公：2008年，把我当成形容词用的时候，我的承受能力还比较差，会很愤怒。但是时间总可以证明很多东西。而且，如果要变革一些事情而没有争议，那就奇怪了，说明我们的创新性还不够。

《**水木清华**》：孔子曾说“四十不惑”，您对此如何理解呢？

施一公：我的“不惑”更多地是一种想明白了之后的无奈，只能做一个良心人。如果每个人都做一点的话，社会就好多了。✎